

编者按：

《经济 学人》周刊，现在正式与广大读者朋友们见面了！该《周刊》主要定位于国内著名、知名经济学专家或学者，高等院校教授、以及政府经济官员，运用经济学基本理论、工具对宏观经济决策进行权威性、趣味性和可读性的个性解读；主要刊发这些经济学人，对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经济时事的最新解读与思考；对现实经济生活、民生事件从经济学角度的理性思考和研究，以及他们运用经济学观点和思维，对热点经济现象背后的思考。

该《周刊》欢迎专家、学者们踊跃投稿！



紧紧抓住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一主攻方向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谢鲁江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第四部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提出了五大方面的任务和要求，其中就提出：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报告强调要“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我理解，要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在认识上必须合理地看待结构与总量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必须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突破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的结构瓶颈上。

1、从经济增长来说，总量是目标，结构是支撑。

经济增长，根本点还是在于需要足够的总量增长空间，即可可持续发展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社会财富总量的稳定增长。因此，无论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总量增长仍然是目标和结果。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内在支柱，是总量扩张的支撑点。没有有效的结构支撑，总量增长是难以持续的，没有合理的结构匹配，总需求和总供给难以达到均衡，要维持总量的稳定难度也是很大的。因此，把结构调整合理了，并通过大力鼓励创新、创业来带动新的产业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的结构支撑的形成，对最终实现经济总量的持续稳定增长，是非常必要的。

2、从社会生产力的构成来说，反映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标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力的质，一是生产力的量。

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来看，反映生产力总量的通常是 GDP，而反映生产力质的水平的则是经济结构。生产力是由质和量两个方面构成的。因此，GDP 的增长是发展生产力，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升级也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总量的不断扩张和质量的不断优化升级，共同构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内容、发展要求和发展途径。

3、在不同阶段，要抓住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主要制约瓶颈，将其作为解决经济发展诸多矛盾和问题的主攻方向，作为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区分两种制约因素，即总量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由此，也需要认识和区分制约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的两种瓶颈，即一种是结构性瓶颈，一种是总量性瓶颈。总量性瓶颈是指总需求和总供给出现不均衡现象，造成经济过



的经验就是由政府进行凯恩斯主义所提出的“需求管理”，即通过对构成需求的“四驾马车”——消费、投资、政府开支、出口这四个方面，进行扩张性或收缩性的管理，以达到熨平经济波动的目的。这种需求管理的主要政策手段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当出现重大结构性矛盾时，这种单纯的需求管理，被历史经验证明，就有些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了。因为结构问题，是属于供给方面出了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而不是市场需求不足。这时如果继续采取单纯的需求管理政策，一方面会刺激虚假需求，从而会带来固化原有产业结构和扭曲市场需求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妨碍着资源按照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流动配置。这就需要采取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的政策选择。一方面通过需求管理达到稳定总量的目的（注意不是刺激总量），另一方面促使资源及市场主体的行为向结构调整的方向倾斜。

第二，从政策手段上来看，就是从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转向以产业政策和收入政策为主。其中最突出的政策选择就是减税及优惠税收政策。通过减税把更多的收入和资源留给企业和居民，再通过优惠税收政策把这些资源和收入引导到创新和创业上去。这样，通过企业和居民的“两创”行为，培育出新的产业增长点、就业增长点、收入增长点，从而达到结构调整的效果。收入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向民生倾斜的收入政策的调整，则直接有利于增加内需，能够有利于达到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要求：即“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第三，总量调控的主角是政府，结构调整的主角是企业和居民。在政策调控重点转变的时候，还需要明确在内容不同的调控中，主角是不同的。政府掌握着财政和央行，因而在总量调控中，必然会居于主角的地位。而在结构调整中，需要找到财富的新的增长点，而直接掌握生产力创造财富的主体是企业和居民，因而结构调整的主角就应当是企业和居民。因此，在结构调整中，就需要注意着重解决如何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居民的积极性、创造性问题，着重解决其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的社会、体制、政策环境问题。而这样的政策调整，是符合十八大报告所强调的“四个着力”的精神的，即“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林毅夫：明年内地经济增长率将维持约 8%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近日在北京表示：目前政府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低很多。

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即还有好的投资项目。在国内资金和外汇没有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必要时可以进行新一轮的宏观调控，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信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会回暖复苏，料明年整体上会维持在 8% 左右甚至更高。

林毅夫又指出，虽然内地经济从 2011 年起已连续 7 个季度增长速度放缓，但这是周期性而非结构性的。由于中国现在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是欧洲。但欧洲因为欧债危机，2012 年经济出现负增长，使得中国的出口需求降低，中国对欧洲的出口放缓；其次，2008 年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投入 4 万亿元人民币进行有关建设。当时的工程有很多现在已经完工或正在在收尾，若未有新的投资，那么

(李金磊)

城镇化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途径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董小君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结构变动。改革开放 30 年，我国国民经济结构虽然得到了不断优化升级，但经济结构失衡仍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中的长期矛盾。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和冲击，从表面上看，主要表现为外部需求的急剧收缩而导致的出口大幅下降，从深层次上看，则是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依靠生产要素高强度投入的经济发展方式，所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加剧结果。结构性矛盾，在需求结构上表现为内需与外需增长不平衡，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在供给结构上表现为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主要产业处于“微笑曲线”的中端，产品国际竞争力低。在城乡结构上表现为城乡二元体制存在，城乡发展不协调。在区域结构上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区域差异化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进一步凸显了这些结构性矛盾。

其实，我国从“六五”到“十二五”，一直都把经济结构调整放在愈来愈重要的位置，但迄今为止，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进展并不理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到合理的解决问题途径。可以说，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



径。

城镇化有利于提高消费率，解决投资与消费结构的失衡问题。“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未来五年要将居民消费率提高 2%~3%。问题是提高哪部分人的消费率？从结构分析，我国最终消费率主要呈现两个下降特点：一是在全社会消费中，政府消费率相对保持平稳，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较大。统计数据显示，1978 年到 2010 年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 62.1% 下降到 47.4%。其中，政府消费率由 21.4% 上升到 28.7%，居民消费率由 78.6% 下降到 71.3%；二是在居民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率相对平稳，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统计数据显示，1978 年到 2010 年间，城镇居民消费率从 73.9% 上升到 76.8%，农村居民消费率从 62.1% 下降到 23.2%。可见，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持续快速下降，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乃至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可以说，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的瓶颈是农村居民的消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指出，只有当城市工业部门扩张到能够完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时候，工资才会增加。上个世纪 90 年代，也有专家指出：“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的重要论点。而城镇化一方面能够将农民转化成市民，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来提高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可增加对农产品或农产品加工品的需求，这可以以稳定或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农民收入。

城镇化有利于提高第三产业，解决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印度经济学家撒克将工业化定义为“脱离农业的结构转变，即农业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份额上升”。工业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国际经验表明，凡是工业化

与城镇化协调一致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转变都采取梯度转换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在稳步提升。统计数据显示，从 1979 年~2011 年间，我国第三产业平均增速为 10.9%，比同期 GDP 的增速高约 1 个百分点。同时，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也在明显提升。1973 年，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是 17.3%，而到了 2011 年，这个比例提高到了 41.6%。随着产品升级和技术含量的提高，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将越来越小，将来增长和就业的出路都只能在第三产业。但第三产业扩张的突破口在何处？其比重如何才能从 2011 年的 43.10% 上升到 50% 甚至更高？答案是城镇化。因为服务业的扩张和发展皆需要人的集聚。没有人的集聚，无论多么强有力的措施和政策来支持服务业的发展都是不能持续的。国外的大量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经济腾飞一段时间后，制造业会向中小城镇转移，但服务业却总是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可以推断，如果中国的城镇人口规模增加一倍，服务业在 GDP 中的份额自然而然会大幅度上升。所以说，中国的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是产业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只有加速城镇化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调整经济结构。

城镇化有利于解决二元经济体制，实现城乡经济统筹发展。改革开放 30 年成就举世瞩目，逐步破除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广大农村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尚未解决，就是对于几十年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相对滞后，甚至可以说这 30 年来，基本上没有触动城乡二元体制，因为农村家庭承包制是在维持城乡二元体制的前提下推行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滞后，增加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难度。“十一五”规划指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现在已经 20 年了，再不着手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不仅阻碍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而且还会使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使广大“农民工”不得不徘徊在城乡之间。

城镇化有利于解决地区间的差异，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相对滞后。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的水平及进程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及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中西部的城镇化水平较低。2010 年，我国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地区城镇人口比重分别为 62.03%、56.40%、43.03% 和 39.56%。分省来看，目前我国城镇化率最高的是上海、北京、天津，城镇化率分别高达 88.60%、85%、78.0%，城镇化率较低的省份是甘肃、贵州、西藏，分别为 32.70%、29.90%、23.80%。

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结构深刻变化，最终要体现在空间结构的变化上。城镇化是生产要素在区域空间合理集聚的过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以城镇化为载体。未来 30 年，中西部崛起城镇化仍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西部地区很多地方城镇化发展不足，产业发展的空间较大，为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条件。在那些发展条件好、环境容量大的中西部地区，可通过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做好承接东部转移来的产业和人口。

甚至不少企业还会抛弃原有的产业改投政府支持的产业，自然就毫无市场竞争力可言，企业的生产目的变成了跟风，纯粹为了补贴而从事这个行业。

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本来发展得很好的产业，不到两年就出现产能过剩，更不用谈朝阳产业。“市场上很多产业本来发展得挺好，但政府一引导一号召，产品价格马上就下来，卖得比白菜价格还便宜。这些教训值得反省，政府应该做政府该做的事。”他说。

(桂衍民)

余永定：CPI 将持续回升 货币政策有宽松空间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11 月 CPI 同比上涨 2.0%，重回“2”时代；PPI 则同比下降 2.2%，环比下降 0.1%。

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11 月 CPI 同比涨 2.0% 符合预期，未来一段时间还会持续回升，但时点不好判断。

余永定认为，CPI 水平仍然意味着货币政策有宽松空间，但当局同时也要考虑到房地产调控问题。

名家观点

厉以宁：点题新城镇化：老城区 + 新城区 + 新社区

全国政协经济委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12 月 9 日在“第十二届中国经济论坛”上表示，“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三部分构成。中国不能学西欧，走反城市化道路。”

老城区城镇化是指，改建多年形成的棚户区、工厂外迁区，使之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商业区和服务区。新城区指开发区、实验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等。新社区就是新农村建设。

(王秀强)

重启改革议程 吴敬琏谈“改革三步走”

近日，吴敬琏谈到了“改革三步走”，他指出，第一步就是所谓目标模式的确定。现在说法叫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确定。第二步是制定各方面改革的方案设计。并且根据各方面改革把他们之间的配套互动关系做出一个总体规划，或者叫做行动的纲领。第三步就是实

施这个行动纲领，打破阻力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

吴敬琏认为，“十八大”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决定，符合大众对十八大有关“重启改革议程，启动我们改革的再出发”的期望。“但是我们现在第一步走出去以后，第二步，第三步怎么走就变成一个很迫切的问题。”

吴敬琏认为，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总体规划设计好。“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环绕一个中心，就是完善竞争性的市场体制，环绕这个中心对财税体制、金融体系、国有经济、市场监管、社会保障体系，还有政府职能等方面都要做出改革的方案设计，而且把这些方案设计综合起来，明确改革的重点，做出各项改革的实施步骤和配套关系的安排。”

“我们现在需要讨论改革应该从哪些方面下手，应该怎么进行，只有这些问题明确以后，我们才能第三步”，吴敬琏说，“虽然设计好了，但是因为既得利益现在越来越强大，如果不能克服这些既得利益设置的阻碍、障碍，改革也很难推进，这些方案和总体规划也难以落实。